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an elderly man, Fu Zhenlun, with a serious expression, wearing a dark jacket over a light-colored collared shirt. The portrait is set against a textured, light-colored background.

傅振伦 学述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名家学述

DANGDAI
RENWEN SHEHUI
KEXUE MINGJIA XUESHU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RENMIN CHUBANSHE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名家学述丛书

主编 林在勇

傅振伦著 陈怡 整理

傅振伦学述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RENMIN CHUBANSHE

丛书策划:周游工作室
责任编辑:周向潮
封面设计:信天翁工作室
责任校对:韦 伟

傅振伦学述

傅振伦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激光照排	杭州天天电脑信息处理有限公司 (杭州武林路 125 号)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 (杭州环城北路 41 号)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12.3 万
插 页	2
印 数	1 - 4000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1675-X/G · 457
定 价	1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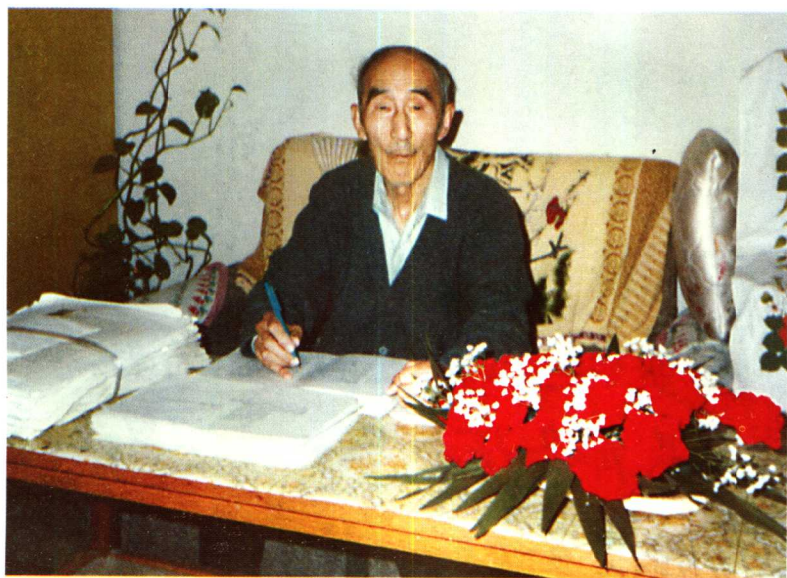
治學之道求經世致用為國
為民服務少勤學好問深思
勞理身體力行仍須愛惜身心
物盡力與時光

傅振倫書以自勉



一九九七年夢九二叟

傅振倫手迹



傅振伦先生1996年9月在书房



傅振伦先生部分著作

目 录

MULU

傅
振
伦
学
述

岁月如斯	1
吾爱吾乡	1
清高明达之志	8
北大求学期间	13
五千年与八万里	17
书生报国	22
重返故都	26
桑榆晚晴	33
七十年治史	36
爱国必先治史	36
详读三史，细辨得失	38
我论史学三家	41
史志叙事应简约	49
循沿革，做考证	52
不治史料，无以治史	56
多多益善，搜集史料	56
系统整理古籍	59
档案乃史料之渊海	66
公文档案管理	71

“地下二十四史”	74
“博物是实物的图书”	79
平民化的博物馆	84
踏踏实实，从头做起	90
古瓷因缘	93
研究陶瓷的缘起	93
瓷器的历史	94
古代陶瓷专家	101
不知真者，不能辨伪	103
我与方志学	106
民国学者论方志	106
编修《新河县志》	110
实践出真知	115
方志理论探索	120
新时期，老问题	128
整旧编新，今日方志	137
方志人才培养	140
研志心得	14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145
附 录	151
年 表	153
主要著述目录	163
研究评介资料	194

我一生兴趣多端，杂而不专，及老百无一成。惟平生写作不辍，芜杂寡要。

一生的著述，不包括未发表的，其数量有 400 多种，约 370 万言。尝董理旧作，计有方志、史学、科技史、瓷器、考古、博物馆、图书馆等诸方面篇章。然一一细考其所为，似亦颇有可述者：

岁月如斯

吾爱吾乡

我出生于河北省新河县。先人事迹，已难考求，仅有文字简约的谱牒可稽。我的先世是山西人。元末，长江流域及淮河流域饱经天灾人祸，闾里为墟，人烟断绝，租税不入。明洪武年间，朝廷听从众臣之议，实行移民屯田。山西自古户口稠密，家给人足，乃成为迁民重点。明永乐二年，我的 12 世祖傅百万、宝成、百成便随此迁民之潮远离故土，定居新河。先祖在这里白手起家，经过多年的艰苦劳动，战胜了“十年九旱”的灾荒，改变了自然环境，养成了质朴耐劳、克

勤克俭的优良传统。我家世代务农，至我曾祖志廓公，因生计困难，遂借贷亲邻，印染布帛，作妇女袖饰，人称“印花袖子傅家”，开设商铺，生活才渐转好。我父赓莱公为乡塾师，兼务农。

1906年9月25日（清光绪丙午年夏历八月初八，丁酉月壬申日丙午时），我出生于直隶省（今河北省）新河县东城召村。曾祖生三子八孙五曾孙，全家四十余口，四世融融而居。吾家家风淳和，待长工如家人，必待其餐毕，方准家属用饭，济贫救灾，每每尽力而为，乡人常谓吾家厚德。

我是四世同堂家庭的长孙，名振伦。（在念中学期间，同学将近成年，相称不用名讳而用别号，有人为我拟字维本或衍五，我选了前者；因喜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乃号希王；因好习武，又号与维本同音的威贲。）自幼受家长钟爱，但教育极严，戒浮华、崇勤俭。至今仍生活简朴，节约成习。（按：傅振伦先生尚在求学时，常布衣蔬食，且黎明即起，从事学习或农家劳动，假日归家，即易旧衣，背柳筐到村外拣肥。盖家长诏示农为邦本，勿轻劳作。）我5岁时，父始口授《三字经》、《百家姓》及《千家诗名句》，诵习了诸如“一去二三里，来回四五家，清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并教以“学而时习之”、“学以致用”、“知行合一”，使我终生受益。此外，父亲还让我背诵《算法统宗》的歌诀，以备农家之用。有一年我从中学放寒假回家，父亲谆谆教训我：“高粱酒醇，味壮大易醉，真坏事，青年应禁不入口！”因此我也终生不饮酒，并遵中小学老师教导，一生戒烟。

1911年春，我6岁时，曾祖母即送我进村里唯一的私

塾读书。这座小学是由在江南致富的族人傅永敬于同治八年捐地兴建的义学。启蒙师是冯家庄表伯冯克己。他是清季廪生秀才。上学第一天，我和堂弟振荣首先向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牌位行了跪拜礼，再向冯克己师磕头。当时用旧式念背打教学法，读《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及四书，三年后毕业。

1914年，我考入县立高级小学。廪生吴永培（字弼忱，毕业于北洋师范）任校长。吴校长治校严格，以期培养德育、智育、体育兼备的青年学子。他身体力行，按传统方法，以身作则地教授学问，推崇思辨以穷理，修身笃行以接世物。尝为全校学生亲自讲授修身一课，禁止学生怠惰、贪玩、赌博、吸食纸烟，犯者严惩不贷。常告诫学生非礼勿视，不许东张西望，不许斜视妇女，衣冠要整齐，不许随地吐痰，不许毁坏寺庙经卷文物。可以说，吴校长的一言一行都深刻影响了我的一生。

史地教员张景明、阎选明讲授了我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化，使我对祖国的地大物博、悠久历史以及先民的勤劳与智慧有了初步的了解，并从此萌发了强烈的爱国意识。他们曾经教导：“我们可爱的祖国得天独厚，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然近百年竟遭列强的欺凌。立志雪耻图强，责任就落在你们的身上了！”这些话，我终生铭记在心，并激发了我一生的爱国热忱。我后来专攻于史学事业，就是希望能尽我个人绵薄之力，发扬祖国灿烂之文化，悠久之历史，使民众为祖国而骄傲。（按：30年代，傅振伦先生考察了欧洲国家的博物馆。回国后，曾满腔义愤地写了《我国

艺术品流落欧美之情况》、《美帝攫取中国文物简述》、《伦敦所见斯坦因劫自吾国的西北文物》等文，对我国的珍贵文物大量流失海外，感到极为痛心。爱国之心拳拳！)

抗战时，我痛心于可爱祖国竟为日本残暴军人所欺压，而自己乃一介书生，虽手不能举枪抗敌，但心怀必胜之信心，又感念于全国上下众志成城，共同抗敌，遂口诛笔伐，编《民族抗战英雄传》。及时保存了此时的珍贵史料，为抗战作出自己的小小贡献。

我童年时爱听故事。记得祖母曾为我讲过太平军小阎王从城召村西关帝庙经过未进村的故事，以及当时的一些诸如“张大嫂、李大嫂抱着包袱、孩子到处跑”的避难童谣。有时与父老同坐晒太阳闲聊时，话题总离不开乡土传说、小说故事和当时的政治事件。如老鸱窝移民、燕王扫北、刘六刘七造反、长发捻军反清、红灯照起义、义和团打外国鬼子，还有八国联军入侵、孙文黄兴闹革命、洪宪登极，以及三国、两汉、抗辽抗金、《隋唐演义》、《杨家将》、《水浒传》等，无所不谈，娓娓动听。这些故事都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逐渐引起我对历史无限的向往之心。

幼时，父亲常常以柴划地，教我认字，还经常在腊月集市上购买本省武强和杨柳青年画，并为我一一指讲其中的内容：有政治时事、人民生活、传统戏剧、神话故事、民间传说以及人民向往美好生活、象征五谷丰登、天下太平、国泰民安、吉祥如意的版刻图画，还有大美人、胖娃娃、二十四孝等墙画、挂屏等。

我乡每逢年节，或婚丧嫁娶之日，往往会请宋村吹打

会演奏，虽以唢呐为主，更以管、笙、笛、板胡伴奏，还有吹歌，通行的有《高山流水》、《平沙落雁》、《丹凤朝阳》、《百鸟朝凤》、《满江红》等曲。至于打花鼓、耍龙灯、踹高跷更是广泛流行民间的娱乐项目。城召村遇到旱灾，就要抬出三官庙的龙虎山张爷、水帘洞李爷两位龙神的泥像，游神赛会，由男巫（俗称“马子”）向两位龙神求雨，有时甚至要到境内釜阳河的源头黑龙洞祷神祈雨，得雨后也演“谢雨戏”。每当丰收以后，春冬两闲，我村经常邀请武强河北梆子班演出。伶人们在小天地的戏台上，三五人可做万马千军，六七步如行九州四海。剧题不外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小姐丫环之类，表扬忠孝节义，取材小说演义历史故事，多讲人生悲欢别离，而又多以圆满团圆结局。有时演《杨家将》，有最负盛名的旦角“小白娥”者，所演《蝴蝶梦》（俗称《大劈棺》），精妙绝伦，我至今犹有深刻印象，尚觉余音绕耳。我以为，中国戏曲虽常讲一些忠孝节义的封建故事，但对普通民众，特别是小孩子来说，能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到了传统的伦理学、美学等许多知识，很有教育意义。此外昆弋（昆、弋是戏曲声腔的两种。昆腔产生于元代的江苏昆山，在明至清中叶以前极为流行，对许多剧种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影响，也称为昆曲，或昆山腔。弋腔起源于江西弋阳，流行地区很广，由一人独唱，众人帮腔，并用打击乐器伴奏，也称为弋阳腔），乃阳春白雪的高雅乐曲，舞姿美、音韵俱佳，是我国特有的国粹，特别值得年轻人欣赏学习。我青年时期在北平时，曾鉴于昆弋不振，观众寥寥，乃组织北平昆弋学会，为之摇旗呐喊，惜成效不佳。（按：傅振伦先生受家乡熏陶

颇深，极重乡情，虽住京多年，仍不改乡音。一些童年在家乡的平常经历，往往触发了他日后有于此的研究兴趣。可以说这种思旧、记旧的习惯贯穿了他整个学术道路。)

记得我中学时的美术教员沈其淮先生教学生写真。先画静物，我如实画了不方正的墨水瓶。他说画得不好。我说：“它本身就不周正，我是画得逼真，怎的不好？”他说：“写实固然是对的，但也要求美。”我这才领悟到真正的美，必然是真善美兼而有之，后来我为地方修志，也认识到“文以载道，也要务实求真，有益教化”的道理。(按：从这种认识出发，傅振伦先生在他一系列的方志著作中提出了方志贵在实用的观点。他认为方志最主要的作用还是资治、存史和教化。方志乃切实可用之书。)

我自幼即爱收藏文物。秋季农村刨土种小花生，常常会发现一些古钱币、骨针、骨筭，我知其乃过去历史的珍贵遗存，即捡拾收存，遂成多年不改之习惯。今仍藏有高小时的音乐课本，如今阅之，仍可从其中发现当时的教育方针。时值国家饱受列强欺凌之苦，故唱歌本中多是尚武爱国之词，如《从军》、《决死赴战》、《中国男儿》、《中华纪念》、《赞美孔子》等。多年来，不管是重要文件，还是资料印刷品，或是亲友师长的信札、手迹、照片及教科书与教材，我都按惯例择要贴存，收集无失。我总觉得这些可以作为一个时代的良好记录，可以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一些意想不到的便利。现在，我收集的这些稿本文献等大多已捐献出去了。我尝以为文物私藏易于散失，不如公藏可传不朽，于是汇而分赠国家文物机关。捐给北京图书馆者有方志、年鉴、

家谱及其专著、杂文，又有孤本《俄文布利亚特对照字典》；赠北京档案馆者，有关于旧都菜单、剧照、文献图书；赠国家文物局文博研究所者，有国外博物馆书刊、资料；赠中国革命博物馆者，有孤本北京大学李大钊《欧美史学思想史》讲义、陈独秀《文义类例》讲义；赠中国历史博物馆者，有燕下都出土瓦当、陶壶、明广窑胪式瓶、龙泉窑瓷品，西北科学考查团邮票，博物馆机关学校徽章及纪念章，古物陈列所“洪宪”入场券，日报剪存等；赠邯郸陶瓷研究所者，有临淄砖、淄博北朝窑具、辽瓷片、宋平阳窑具，清初“古燕赵和玉造”蚰蚰罐和清代私人堂款及官窑瓷片，与《饮流斋说瓷》作者许之衡书联、中堂及扇面，间有灵光片羽，都是珍贵或稀见参考标本。另所藏方志捐赠北京图书馆，所藏图书与文献手稿也捐赠给河北历史博物馆特藏部，同时也捐献了一部分给北京档案馆，这是1995、1996年的事。惟望其能得其所，充分发挥其作用，也算了我平生一大心愿。

1918年，我考入冀县直隶省立第14中学。学校管教甚严。学生多是质朴弟子，勤学好问、俭朴耐劳、遵法守纪，惟性多保守，伏案读书，少关心政治。当时理科教材多用英语课本，学生课业负担颇重，体力多难支持，中途退学者有之，得病夭折者有之。为此，校长杨显卿（冀县人，毕业于北洋大学）特意聘请八卦拳始祖董海川的高足梁兆亭朝夕教习学生武术，使我辈体质日健。河北之民好侠尚武，农民“带刀而锄，带剑而樵”。我在高级小学就曾练习过外家拳的三皇炮捶及赵子龙大枪、匕首，但颇觉吃力。至是改习内家拳，外柔而内刚，体力益健，坚持数十年锻炼不辍，至今

年挂九十，仍步履矫健、精力充沛，实深受其益。

武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一，至少有二三千年的历史。它不仅能强身保生、外御强敌；更有“习手足、便器械”，美化人生的作用。我国武术向分内家、外家。外家习肢体，主于搏人，以勇武称。内家习内功，以静制动，刚柔相济，主于防卫。我所学的八卦掌内家拳相传于武当山张三丰。张三丰以“阴阳化育揉球式”作动静长生之功，依八卦、五行而定为十三式，内而精、气、神，外而手、腿、身，必求其六合；内合心、力、气，外合手、足、膝，始得为全功。八卦掌创于清嘉庆年间河北董海川，基本步伐有起落扣拢，或进退闪挂，或左右横顺，或反正转身，具有阴阳变化之妙，有走、视、坐、翻等特点。练武要求顺颈提项，松肩沉肘，实腹畅胸，曲腿躺泥，能做到：桩如山岳，步似水中，气似云行；精神贯注，气势充沛，练出机警敏捷的精神。我习八卦掌，得益甚多。由于幼年饮食不慎，患肠胃病数年，身体孱弱消瘦，自学艺后体力日健。今虽已至耄耋之年，犹每日练习不辍。同时，由于我跟随梁兆亭习武，慕其人，羨其义，每遇不平事，辄拍案顿足与之斗，常得罪人或斥我为匹夫之勇。我平生所失也多源于此。

清高明达之志

1922年夏，我17岁时，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当时我为能考入这所全国最高学府而深感庆幸。此时正值五四运动

之后，我受此影响，赞成“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主张，遂学习理科。

1924年春，我与中学同学王冲天、师景泉、张博文等创办私立清明中学。清明者，清高明达也。校旗通幅蓝天，取其清高；有红日白月，取其光明，有旭日东升之象。教职员都是无偿供职，甘尽义务。师生一面学习，一面劳动生产。然而当时任北平海陆军大元帅张作霖认为我们在宣传“赤化”，逮捕师生数人，勒令停办关闭学校。之后，我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北大当时是新文化与革命的策源之地。我初考入预科时，对新的事物，无不感到稀奇，亦无不怀有兴趣。1922年研究所国学门常惠、顾颉刚等组织歌谣研究会，江绍原发起风俗调查研究会（后改民俗学会），林语堂（林玉堂）成立方言语音研究会，并编印《歌谣周刊》、《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等会刊，我对这些都非常感兴趣，也参加了相关的调查研究，写了一些短文。

当时北大的校长是蔡元培先生。他是全国敬仰的大教育家，他的言行对我日后的学术研究有很大的启发。蔡元培先生认为康梁变法失败之后，更应重视教育，培育人才，始从事教育工作。他提倡爱国主义，发扬法国标举的自由、平等、友爱，并结合我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中的义、恕、仁等儒家精神。他主张革除男子吸烟和妇女缠足等陋习，倡导美学，提倡建立进行宣传教育的博物馆。

蔡先生一向赞同国际交往，并主张宜用国际通用语言。他极力宣传波兰柴门霍夫创造的国际通用语

Esperanto。1912年《东方杂志》9卷5号上，他在《上海世界语学会演说词》一文中谈到“语言之价值、国际共同语之必要、柴门霍夫所创世界语之适宜中国人、采用世界语为辅助语之利益、将来之希望和对该学会之希望”。蔡校长为了帮助学生进一步对世界语作高深的研究，仿德国大学之一例，创办北大世界语研究会 La Instituto por Esperanto 于沙滩红楼三楼东端。自任会长，无锡孙国璋副之，还亲自在北大世界语学会主办的世界语讲习班上听课。此后全国世界语运动，遍及南北，蓬勃发展，甚至远及云南也兴起了世界语的宣传运动。

1923年夏，苏联盲诗人爱罗先珂受北大之聘，讲授世界语会话。他讲课时，用英语口授，有时由耿济之翻译。我与级友杨景山（与李大钊先生同日殉难者）偕同参加学习。授课的地方，在北大红楼二楼第五大教室，讲台左右，加桌加凳，犹不能尽容。此时，北京世界语学者，与日俱增，惟互无联络。这年6月11日，在北京政法专门学校（今太仆寺街）举行盛大的演讲会，会上大家用世界语交谈。爱罗先珂的世界语独唱博得会员喝彩。中国世界语的宣传至此达到高峰。后来，我还加入了寰球世界语协会（U·E·A）为会员。因在学习感到世界语图书的缺乏，1926年我编辑了《英汉双解世界语词典》，附录了文规、文法及《世界语主义宣言》，把基本的重要的常用词汇和世界语常识、世界语规范、语法等概括无遗。手此一册，便可通行世界，与全球世界语学者会话。1927年我在编辑世界语作品时发现，不常用的词汇，往往由英法字典中查找，颇觉不便，因于5月编